

一得集

崔凡芝 著



崔凡芝史学散论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崔凡芝史学散论

一得集

崔凡芝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崔凡芝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5013-3594-7

I. 一… II. 崔…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468 号

书 名 —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著 者 崔凡芝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 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13-3594-7/G·735

定 价 25.00 元



作者和她的学生们

山西大学

自序

古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非智者，「失」者多矣，即便是「愚者」，亦往往便成为今天集结的这本《得失集》。因为所述内容又多点滴感受，故称之为「散」中的文章。大作分两类，一为言类文章。史学论文又分作、史籍、史注、史学研究、



山西大

故通、整饬之理”，而绝尚制割，究于国计无补”。《货殖列传》所列三入“国之”、“利道之”奇之”的行政管理的系列幕下的富国发家之策，司马迁总结成之，中民盛赞其为“正大古董”的理财大论。“解析中这震对《平准书》、《货殖列传》注之旅说方式，写出了《司马迁与商地政》再探讨》一文，评价说：“中民的评深刻的，也是全面的。在一定程度上，既于古人中那些失其真、过其实的毁誉者，

自 序

古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非智者，“失”者多矣；但记住了“千虑”，即便是愚者，亦往往有一得，积累起来，便成为今天集结的这本小书，所以名之为《一得集》。因为所论内容又多为教学与科研中的点滴感受，故称之为“散论”。

《一得集》中的文章大体分两类，一为史学论文，一为序言类文章。史学论文又分作两司马研究，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杂论三部分。序言类文章多是给自己编撰的书籍和古籍整理成果所作的概述。

两司马研究部分的文章各自成篇，各有侧重。对司马迁，重在对其经济思想中的工商业政策思想的探讨；对司马光，重在对其治学、成才思想的研究。我在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时，十分惊讶其对商人、商业有如此深刻全面的认识，于是写了《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一文，对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和工商业政策思想做了概括分析。针对当时学术界持司马迁是自由经济论的观点，我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基本还是以农为本的思想，还不可能摆脱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窠臼。对其“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五句话，要做整体认识，不能仅取“善者因之”一句话，就得出“因之”正是“自由经济”的结论。这篇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后，我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连续发表了三篇有关五句话形成的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的探讨文章。1992年刊登在《山西大学学报》上的那篇是就此五句话分析其政策思想的层次和针对性，

1995年刊登在《孔子研究》上的那篇主要谈其局限性，即阐明其未能摆脱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窠臼，是时代局限性使然。清代学者牛运震著有《史记评注》一书，我为其作点校整理，其所评之《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很得司马迁著述宗旨的要领：牛氏认为司马迁以《平准书》讲富国，以《货殖列传》讲发家，无论是富国还是发家，司马迁都强调了“持大体”、“引正道”。在对比汉初和武帝时的两种富国政策时，司马迁讥刺武帝好利，依靠商贾敛财，是不识大体，违背了建国初抑末贱商的传统，丢掉了祖宗治国的大法。认为汉初的重农抑商政策能够“足国生财，自有利道、教诲、整齐之理”，而“《平准书》言利，纯尚剥削，究于国计无补，所谓最下者与之争”。《货殖列传》所列三种致富手段，亦应纳入“因之”、“利道之”和“教诲之”、“整齐之”的行政管理的系列之中，这正是国家统筹下的富国发家之策，司马迁总结成的五句话，牛氏盛赞其为“正大古重”的理财大论。我以“解析牛运震对《平准书》、《货殖列传》的评注”之论说方式，写出了《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再探讨》一文，评价说：“牛氏的评注是深刻的，也是全面的。在一定程度上，既高出于古人中那些失其真、过其实的毁誉者，也比今人中推崇司马迁是自由经济论者的说法客观与贴切得多。”从而也提示了今人研究古人与古事，应去除浮躁附会的学风，如牛氏一样客观与平实些。

《试析汉武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一文由我的研究生丁波执笔写成。在讨论中我们认为，司马迁能敏锐地发现并批评汉武帝推行新经济政策中的偏颇，是正直史家坚持实录的职责使然，也是思想家追求事物完美的表现。而评价政治家的历史政绩，既要看到结果也要看原因，既要看到结果的负面，当然也要看其正面。这篇文章主要分析新经济政策形成的原因，即深层背景和现实需要。推行的结果，相当程度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不失为是一次成功的变革。而汉武帝后期能纠正弊病与偏颇，亦不失为一代明主。此文与前四文所谈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的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

了作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司马迁，其思维方式似乎与政治家是不尽相同的，其追求中有偏重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成分，这是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

司马迁追求理想与完美，在对“太伯奔吴”传说的处理上，亦有一定的体现。“太伯奔吴”一事，如今看来，在文献记载、考古验证和文字解释上，均存在诸多疑点，但司马迁对中原之虞与江南之吴的关系，加了一段武王封周章之弟仲雍回到周之北故夏墟立国为诸侯的情节，并感叹地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查看现今《左传》，即《春秋》古文，并无一处有此明言，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做如此弥合呢？我和研究生张莉所写的《〈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一文，在列举了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及文字解释的诸多疑点后，提出司马迁借助传说的史实、适应当时民族融合的需要，受到时代理念的浇铸，在追求理想和完美中，往往会有以思想认定来推想历史原貌的情况，故读者必须有辨析的眼光，即使是对被誉为“实录”史家的司马迁，亦不能盲从。以上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一些探索。

对司马光的治国思想和著史成就，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讨论，但对其治学特点和人才鉴定，则少有论及。我在阅读《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司马文公正文集》、《司马温公年谱》等书时，发现司马光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和形成的人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从政思想和著史取舍，于是写了《谈司马光治学》和《司马光的才德观》两文，揭示了其从政是从儒家经典中提取治国的原则，著史是从古今事物之情状中探讨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选才是从辨别贤愚忠奸中获得用人的启迪。故而形成了其偏于保守脱离实际的治国思想，体现在其历史巨著中的鉴戒思想，也就更多地显示了其政治说教的特点。

阅读中，我看到故乡在司马光的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他说“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又说“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异才”。于是我写了《司马光与故乡》一文，在历数其对故乡深沉的眷顾之情中，又介绍了其严格的个人修养，整饬家风，德化乡党

并扩大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历程，虽然不能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但其爱乡爱国的情怀，还是令人十分感奋的。而他在故乡的种种形迹，也应当作其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一文是我的研究生肖淑贞执笔写成的。也许是受三晋地区多民族融合状态下，传统的“和戎”思想影响，司马光在民族问题上，向来反对轻易使用武力，崇尚友好和平，提倡各民族共生并存的政策，对此，我们是应当给以充分肯定的。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一文是应《山西通史》写作组的约稿，将我的几篇文章综合而成的，是一篇比较全面评价司马光的文章。

山西人有“三晋两司马”之称，引起世人非议，尤其是邻居陕西韩城人力辩其非。确实，司马光祖籍山西夏县，是为晋地之人，没有争议；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已明言其祖籍夏阳，即今陕西韩城县。如按现今的区域划分，韩城在陕西省，司马迁当然是陕西省人。但如果从两司马的家族传承、夏县与韩城两地所属地区的文化关联看，二人又有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对这些联系加以考察，称“三晋两司马”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对两司马的文化关联，有以下三点考虑：

一、两司马同祖同源。司马迁追述家世时说其先祖为世袭史官，传至西周为程伯休父。司马光曾刻有一枚“程伯休父之后”的印章，又曾自称为“程秀才”，可见二人认同为一个祖先。司马氏后祖中又多出精通兵法的军事家，如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懿等。故二人竭尽平生撰著《史记》、《通鉴》，可视作是对史官家族职业的继承；著述中对战略的交待，对战役的精彩描述，又可视作是对家学的继承。

二、籍贯同处一个文化区。大而言之，夏县、韩城属晋、豫、陕三角地带，这是中华民族的祖根之地，即中原文化区；小而言之，则二地均在三晋文化区内。

夏县在三晋文化区的中心地带，韩城则在晋秦之间，属于拉锯

之地：春秋时属晋，春秋末司马氏入少梁（韩城古称少梁）时属秦，三四年后又属晋。三家分晋后属魏，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秦惠文王时属秦，改名夏阳。历秦汉百多年后，司马迁诞生于此地。故从隶属关系看，受晋与三晋管辖的时间相当漫长；从生活习俗看，两地虽以黄河为界，但船只往来方便，冬天结冰，便为通途。两岸民众的婚姻、贸易、文化交流不断，故其语言、习俗基本一致，或极其相似。因此说，韩城是在中原文化区内更具三晋文化特质的地区，可视为是三晋文化区的边缘地带。

三、“迁生龙门”表达了司马迁对这一地区的认同和自豪。龙门山坐落在韩城和河津两地，中间断壁相望，直立如削，传说为大禹治水所凿，古称禹门。黄河从中流过，汹涌澎湃，如神龙腾飞，故又称之为龙门。后又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实为人们对先王治水精神的景仰和对雄伟秀美山河的热爱而加以神圣化的。司马迁以龙门为桑梓之地，并以此地为荣，我们大可不必去追究其到底是生于西岸还是东岸，就其对此地文化环境的认同和自豪，可以探究一下他学术思想文化的渊源。他以很大的篇幅写出《五帝本纪》，清晰地勾画出中华先王的传承脉络，正与此地祖根文化对其的陶冶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称作西河地区，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子夏设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他们吸纳百家，构筑了法家的治国思想，成为三晋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兼容并包、开拓创新，在秦晋大地得到广泛运用，最终由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司马迁的先辈及其自身，显然都受到了这种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史记》中，不但对晋与三晋的历史有着详尽的描述，而且对由此地走出的法家人物在事业上的成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生动的记述。其“迁生龙门”的自豪感，与本地人才辈出的历史渊源不无关联，而与司马光“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三晋由来产异才”等的表述，又有着何其相似的感受啊！从这一角度看，如称“三晋两司马”，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有关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等部分的研究，亦为点滴心得。在史家方面，主要涉及到孔子的史学贡献和晋国史官世袭制的状

况。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公认的，但说他是最早的史学家，世人则不甚了了。《论孔子的史学贡献》一文，正是从孔子首开私人著史、创新编年体例、规定著史义例三方面，论证了孔子的史学贡献。为了进一步论证其私人著史的意义，我与研究生张惠芝又写了《试论孔子治史的历史贡献》一文，从孔子治史的宗旨、私人治史的条件、对私人治史工作的改进创新等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中尤其对治史中义理的“窃取”作了高度评价，认为真正使史学性质发生深刻变化的、赋予史学以内在生命力的，还在于“窃取”这一方式的出现。这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它使史家有了相对的人格独立，也使史学有了相对的学术独立，唯其能够“窃取”，才最终形成了我国史学从学术层面指导治国的经世致用的模式，后人沿袭成为我国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

我对史学史的研究，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史家主体修养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切入对形成史家成熟的条件加以探讨，这一走向似从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可见一斑：1990级肖淑贞写《章学诚“史义”探微》、1992级张惠芝写《章学诚“史德”论探析》、1993级张国华写《试论唐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1994级李珍写《刘勰“素心”说探析》、叶瑞昕写《司马迁史家主体意识的现代阐释》等等。第二阶段则把重点放在了追述早期史学形成条件的探讨上，主要是与文明程度的关系上。这也反映在了我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题目上：1995级张爱芳写《先秦晋与三晋史官与史学探讨》、1997级廉敏写《中国史学在中国早期文明演进中的形成过程》、1998级丁波写《试析晋国史官向三晋史官的演化》、1999级王秀丽写《先秦时期的史学与文明》等等。两阶段互有照应，相辅相成，依然是以史家主体的成熟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我们认为史家主体条件形成的最重要条件是对“史义”的认识和表述，孔子以“窃取”的方式所表达的“一字褒贬”，正是史家独立判断是非而表现出来的“史义”，并以之指导治国，即起经世致用的作用。之后《左传》之“君子曰”、司马迁之“太史公曰”、司马光之“臣光曰”。

等等，都是承袭孔子之“窃取”方式来表达“史义”而用以经世致用的，这是我国史学发展中最为优良的传统，孔子的奠基作用，使之堪称为伟大的史学家。

这期间所写《〈左传〉的形成与历史地位》、《晋国世袭史官家族初探》、《裴注的史学意义》等文章，均是在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偶有所得而成文的，是有关史著、史官、史注的研究。

1997年至1999年在主持完成山西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的过程中，对用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有了具体体会，在写完导言后，应约又写了《撰写地方史的意义及体例运用》和《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尝试》两文，可视为是对史书体例的研究。

本书第三部分的杂论，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山西的人物或事物。和学生们共同编注的《颂晋文选》一书，正是出于为山西学术文化做点工作的愿望完成的。《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一书，涉及到许多考古知识，出于对故乡的关注和热心，在完成《周人起源山西》的编写中，我又对考古领域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对书稿完成是必要的，而且对自己已有的上古知识，也有了一种实证性的落实感。我后来写的《〈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一文，便充分利用了有关的考古知识。可见拓宽知识领域，对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裨益的，杂论部分的每一篇文章，亦可看作是我对不同领域的有益探索。

附录部分均为序言类，有点校说明，有前言、导言等。我是学古典文献专业的，搞古籍整理应当是本行，但做了教师，便以教学为本职；带了史学史课程和研究生，便以探讨史学史为主攻方向，做点校注释工作便成了业余。抽暇先后点校了三部书，评议了两本书。其中清人牛运震的《史记评注》是退休后完成的。有了闲暇，就想多说几句，于是在校勘记中，对涉及到的有关问题，作了一定的驳正和阐述，其观点往往是多年来在研究和探讨中形成的，虽不全面系统，在此也以“一得”之见的方式叙写出来，供方家指正。

这本小书，收集了我在教学科研中的点滴收获，正是这点点滴

滴，使我一路走来，充实而愉悦。与我相伴而行的，是一群群充满活力而可爱的学生，他们给我以自信，而他们出色的表现，又给我以最大的慰藉。我以为，人生在世，能够常有“一得”，会越走越踏实；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则是一种充满愉悦的幸福，我二者兼有，今生足矣。

崔凡芝

2007.9.29

定稿于科学院第一招待所 205 房间

目 录

自序	(1)
一、两司马研究	(1)
1. 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3)
2.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13)
3.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及其局限性	(20)
4.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再探讨 ——解析牛运震对《平准书》《货殖列传》的评注	(33)
5. 试析汉武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41)
6. 一曲爱国主义思想的赞歌 ——试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史学价值	(52)
7. 《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	(62)
8. 谈司马光的治学	(73)
9. 司马光的才德观	(83)
10. 司马光与故乡	(97)
11.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	(108)
12.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116)
二、有关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	(139)
1. 论孔子的史学贡献	(141)
2. 试论孔子治史的历史贡献	(155)
3. 《左传》的形成与历史地位	(168)

4. 晋国世袭史官家族初探	(172)
5. 裴注的史学意义	(181)
6. 浅谈撰写地方史的意义和体例运用	(193)
7. 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尝试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的写作思考	(198)
8. 试析《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与史学史的关系	(208)
三、其他研究	(215)
1. 晋祠唐碑碑文主题思想探析	(217)
2. 《晋祠之铭并序》旨在颂扬贤德为治	(227)
3. 从《冷庐杂识》一书看清代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 ..	(235)
4. 归允肃与顺天乡试	(244)
5. 论魏象枢的廉政实践与认识	(248)
6. 晋蒙两地民族贸易述略	(257)
7. 试析宋明理学中诚学对关羽忠义形象的影响	(266)
8. 顾炎武与山西学者的交往	(273)
9. 周人起源山西说	(279)
四、附录：序言类	(319)
1. 《冷庐杂识》点校说明	(321)
2. 《寒松堂全集》前言	(323)
3.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	(342)
4. 《颂晋文选》前言	(357)
5. 《史记选注》前言	(359)
6. 《史记评注》点校说明	(371)

一、两司马研究

